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本刊主编:姜锦铭 强晓玲
值班责编:李牧鸣 刘小草 刘梦妮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:(010)88051377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

今世缘 特约刊登
~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~

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?他的红色收藏“补遗于万一”

他与京城“破烂王”结成好友,不断在废纸堆里翻拣珍贵的文字;他奔走于江西、湖南等革命根据地,从乡村旧房的墙缝、房梁抢救下多件革命信函、传单。为此,他不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,还投入很多金钱,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卖掉价值数十万元的古玩……

本报记者刘江

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一天,在北京古玩市场的地摊上,王金昌无意中发现一本用纸绳装订的蜡刻小册子,封面上书“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”。他的心怦怦跳,感觉难以置信:“我一直对中国革命史很感兴趣,对八路军 129 师的事迹耳熟能详,想不到居然能在市面上看到这么宝贵的资料。”

其后,他惊讶地发现这并非偶然——大量本该由图书馆、资料室、研究机构严格保护的革命历史文献被随意丢弃,少数流落到旧货市场,还有相当数量被直接作为废品、垃圾处理,永远地消失了。

从此,王金昌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自文献类革命文物进行收藏。

他与京城“破烂王”结成好友,不断在废纸堆里翻拣珍贵的文字;他奔走于江西、湖南等革命根据地,从乡村旧房的墙缝、房梁抢救下多件革命信函、传单。为此,他不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,还投入很多金钱,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卖掉价值数十万元的古玩。

30 年间,他抢救性地收藏并整理了涉及中国共产党成立、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等时期近 2000 件革命文物。

那些发黄的启蒙书刊、影像模糊的黑白照片、语言质朴的红军家书以及盖着红色印章的公函、法规、证件,浸染着战火烽烟与壮志豪情的浓烈气息,将历史粗砺、立体的面孔推到人们眼前。

目前,王金昌的一部分红色收藏被陈列在北京忠良博物馆,已经免费接受近 10 万人参观。军事科学院专家评价,这些收藏“具有较高的保存和研究价值,是对现有红色史料的有益补充。”

从废纸堆、旧房墙缝和房梁寻找革命遗存

王金昌可谓“奇人”。他履历丰富,做过官也经过商,能绘画会书法,同时又是屡获大奖的作家。

上世纪 80 年代,王金昌是北京古玩市场的常客,凭借深厚的历史知识和过人眼力,成为收藏高手。与革命文物的偶然邂逅,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八路军 129 师的故事王金昌早就耳熟能详。这个被誉为“抗战最能打”的师战功赫赫,令日寇闻风丧胆。关于这支神勇的队伍一直有很



中华苏维埃时期党徽、党证、党章。

多传说,王金昌从《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》中对其屡建奇功的原因豁然开朗:这份 14 页 5000 余字的草案,关键内容有二:视群众利益于最高;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。

王金昌极度兴奋,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材料非同寻常的史料价值,马上掏出几十元钱买下。

几年之后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专家鉴定称,这是“历史文献的珍本”,对于研究我党军队建设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。1995 年,他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军博。

熟知王金昌的人说,他收藏革命文物不是兴之所至的雅好,而是带着感情和信念。

王金昌的红色收藏主要集中于书报、日记等文献材料,遴选的标准建立在他个人对党史的独特视角,强调重要性、稀缺性、生动性。这些文物补充了正史记录的不足,在宏大叙事之外,打捞了诸多具体而细微的历史细节。如中华苏维埃开具的村民结婚证和离婚证,反映了苏区倡导婚姻自由;一封红军家信中写道:“只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才能保障分田胜利”,揭示了土地革命凝聚民心的力量……

王金昌的藏品中不乏珍品、孤品。如苏区石印版的《中共六大党章》,党史专家认为可能是于今仅见的一份单行本。此外,他还收藏了全套《向导》。《向导》是第一份中国共产党机关报,于 1922 年创办,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。1927 年被迫停办,共出版 201 期。

王金昌的收藏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。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,很多博物馆、图书馆大规模建设翻新,大量书稿和文件材料被清理、废弃。之后,扫描和数字技术普及,一些图书馆管理者忽视实物版本的保存,导致一些珍贵资料被丢弃。此外,一些政府机关不注意保存重要文献,使一些领导人和历史名人的文字材料被不经意地当成废品。

王金昌说,那些手书、油印的文字材料数量有限,其所记载的内容不可篡改,因而十分稀缺

珍贵。由于岁月侵蚀和战争环境残酷,许多材料纸张变黄、发脆,虫蛀、雨打、火烧的印迹明显,但破损的外形与残留的内容,无不传递着宝贵的历史信息。

随着留存在世的文献越来越少,收藏变成一场跟时间的赛跑。很多年里,王金昌是京城“破烂王”的大主顾,一接到有废书废报的电话,就火急火燎地去验货。小区的保安常常纳闷:这位明明是个大老板,为啥总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运破烂?

王金昌除了在全国各地的文物市场“捡漏”,更常常趁假期在江西、湖南、湖北等革命老区四处奔波搜寻。

2006 年,王金昌迎来了收藏史上的一次大丰收。江西老区赣州进行大规模新农村建设,拆旧建新的过程中,在墙缝、房梁中发现了 100 多件中华苏维埃、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革命文物。当时已经有人购买,王金昌得知其中有 1930 年兴国县苏维埃编印的《红军歌曲集》,感到非常珍贵,志在必得。为此,他毅然将一件收藏的价值数十万元的明洪武时期的瓷碗卖掉,收购了这批文物。

文物“述说”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

纵观王金昌的收藏,可谓一部浓缩、实物版的革命史,人物与故事栩栩如生。

北京忠良博物馆馆员吴花说,很多观众深感惊讶,私人收藏居然有陈独秀主编的全套《新青年》杂志以及大量“赤色书刊”。

100 年前,中国的命运处在十字路口,救国主张五花八门,政党团体不计其数,各方势力粉墨登场。100 年后,很多人追问:拯救中国的为什么是共产党?

令王金昌十分震撼的一件文物,是一张用草纸写的《卖女状》,一位老人被逼无奈要卖掉十几岁的女儿。王金昌说,看到这个你就

会理解,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参加红军,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妇女参加革命。

北京忠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是大型石碑拓片《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》。深红色的拓片长 2.7 米、高 2.16 米,由朱砂拓印,全文约 1500 字。字迹清晰、画面精美、气势磅礴,是很多参观者打卡留影的背景。

博物馆馆长张晓东与同事经过实地探访得知,碑刻是由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巴中县特别市委员会于 1933 年 11 月刻成。十大纲领是中共六大的提出,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,提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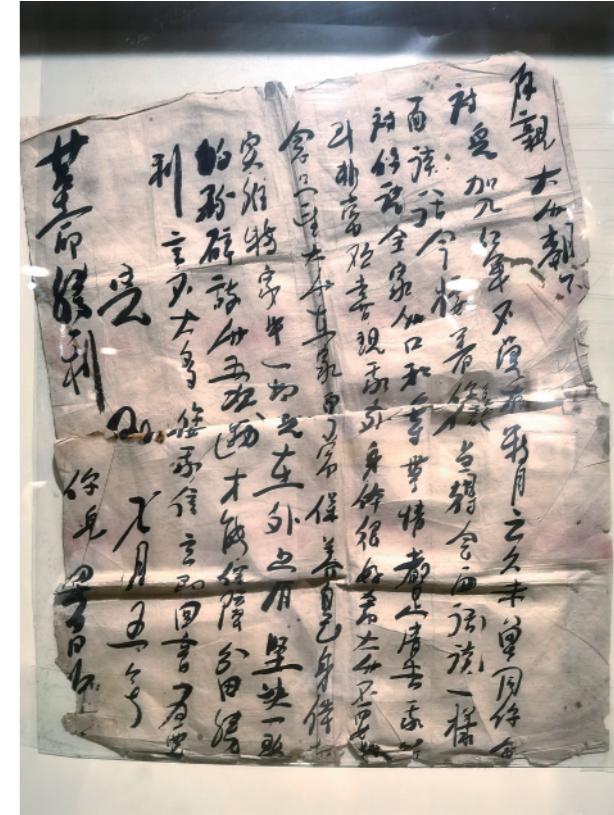
拓片背后的石碑充满传奇色彩。1935 年,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北上后,国民党巴中县县长杨杰下令,让民工砸碎刻有《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》的石碑,称“毁其碑、除其毒”,石碑的三块石板被断成九块。民工感念红军,趁黑夜将碑块埋于西城门内侧的壕沟里。

王金昌还收藏了一份毛岸英手写信件仅有的复印件。这是他在一家出版社处理的旧资料中发现的。在这封写给杨开慧姨妈之子向三立的信中,毛岸英谈及一件家务事——舅舅提出“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”。

毛岸英在信中写道:“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,不讲人情,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,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‘人情’,不讲这种‘人情’。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‘人情’,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,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,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……”

补遗于万一

通过查阅资料、访问专家与当事人亲属,王金昌不断挖掘文物的内涵。白天,他是长袖善舞的企业高管;晚上,他独守青灯引经据



红军家信。

典,甄别藏品的真伪和价值。

人民出版社将王金昌收集的大量票证、公函、报刊进行整理,出版了《陕甘宁边区经济典藏》。这些文物表明,陕甘宁边区选择了第一条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道路。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在序言中写道:这条道路不仅支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,也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的基础。可以说,新中国经济直接从这里走来。

30 年里,王金昌还整理出版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《红色典藏》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北平日记》《建国日记》等书籍,并撰写了大量散文、小说,为一些电影、电视剧的编剧提供历史资料。

他有别于官方叙事的个人视角,复活了大量淹没在岁月长河里的人物与故事,拓展了人们考察历史、观察人性的视野。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、有争议人物的发现。

2006 年 10 月,王金昌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偶然发现了 20 本共约 150 万字的手写日记本。记载了作者自 1938 年到 1943 年的生活历程。日记本异常整洁,漂亮的墨水钢笔字和行云流水般的纪实书写深深吸引了王金昌。

后经了解,作者董毅出生在民初仕宦人家,父亲曾在北洋政府所辖天津任职。1938 年,他考取了辅仁大学国文系。董毅的日记,详细记载了日寇给北平百姓带来的生命威胁和生活困苦,同时真切反映了爱国青年对侵略者兽行的愤恨。2009 年,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金昌整理的五卷本《北平日记》。

王金昌说,如果我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物,能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补遗于万一,为那些牺牲的烈士作为迟来的祭祀,为下一代提供直观鲜活的革命史教材,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。

“希望这部电影帮助年轻人回望百年征程、读懂百年初心”

访《1921》导演黄建新

本报记者刘小草

“一百年前,有一群青年满怀理想和壮志,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,矢志改变中国的面貌。”谈起新电影《1921》,即将迎来 67 岁生日的导演黄建新面带笑容、目光炯炯,仿佛有不完的热情。“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如今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回望百年征程、读懂百年初心的机会,引发他们的共情与共鸣”。

从 2009 年上映的《建国大业》算起,十几年间,黄建新拍摄、监制了《建党伟业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湄公河行动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等一系列国产主旋律佳作。在专注现实主义题材、探索主旋律创作的道路上,黄建新称得上是国产电影的“领路人”之一。

建党百年之际,这位有着 48 年党龄的老

党员献上了一份特别的“生日礼物”——监制、执导电影《1921》,影片由郑大圣联合执导,黄轩、倪妮、王仁君等主演,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数月的历史细节为主线,讲述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时代担起救亡重任的故事。

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难在哪?如何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,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场景、还原历史细节,还要兼顾创新表达。日前,黄建新接受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草地周刊采访,畅谈电影《1921》及其幕后故事。

拍革命历史题材,应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

草地:您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简要概括和

介绍《1921》这部电影?

黄建新:为了《1921》,我们团队已经创作制作了近 5 年时间,凝聚了几百名电影人的心血,电影所呈现的内容非常丰富,很难用几个词来概括。

《1921》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拍摄的,希望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、最早的一批革命先辈的精神世界。虽然他们和如今的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,却有一种宝贵的精神贯穿始终。这种精神是互通的,是超越历史局限的,是一种“传承”。我们想通过对百年前中国最优秀的这批人的“接近”和“表达”,探索“中国精神”到底在哪里。为观众呈现一段丰富的历程,展示一种追求和向往,这是《1921》所希望实现的。

草地:剧组对史实的把握非常严谨,曾花

费 4 年时间打磨剧本,并在全世界开展挖掘史料的考据工作,还邀请党史专家对剧本进行指导、把关,甚至 1:1 复原了一大会址在内的部分老上海石库门建筑。您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?

黄建新:我经常提到一个观点,拍革命历史题材,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,就是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。“大事不虚”说的是大的历史事件必须真实,不能虚构;“小事不拘”说的是可以用合理的戏剧手段、虚构方式,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精彩,和观众贴得更近,让他们喜欢看。

面对史料,每当我们找到一个被“触动”的点,并且是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品质时,我们会将其放大,顺着它的线性逻辑去寻找表现方式。电影里有一段剧情,李达划着火柴准

备烧日货,却发现火柴也是日货,他哭了。他是个性情中人,所以会流泪。他也是“执拗”的,冒着被跟踪的危险去印刷厂,只为把“百姓”二字改成“人民”,目的是让大众知道“人民”才是主人。

不仅是李达,我们也在寻找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。陈独秀是一个非常“任性”的人,电影里有很多围绕这个性格特点的刻画,比如“五四”一结束,他就义愤填膺地亲自上街发传单,被抓捕入狱。又比如,李大钊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,说一句就是一句,他在电影中的台词,中肯又很尖锐。

我希望这些历史人物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,让观众觉得自己和历史人物是有亲近感的。

(下转 15 版)